

华东周刊

EAST CHINA WEEKLY

A1

访谈 Interview

第 18 期 总第 018 期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一 主编:马晓才 执行主编:李 洁 董国荣 美编:楼燕红 新闻热线:0571-85068763 战略合作: 杭商传媒®

■ 马晓才 / 文、摄

华东周刊:首先要祝贺你,祝贺你的《鹰从笕桥起飞》和《一湾到底是大道》分别获得了杭州市和宁波市的第十四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孙昌建:不好意思,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提。写空军抗战的《鹰从笕桥起飞》准备了好些年,本来是 2015 年应该出来的,一直拖到去年,还好杭州市文联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对我不离不弃,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书做出来。宁波的这一本《一湾到底是大道》是奉命之作,通过宁波鄞州湾底村的变化,来写这四十年和七十年。其实于我来说,歌颂的东西更难写,因为我自己划了一条底线,这个底线就是真实,不要说大话空话和假话,好在湾底的当家人吴祖楣和我一见如故,他是一个极低调的人,之前推掉了不少采访,我看他办公室里挂着胡耀邦同志讲话的条幅便聊了起来,原来他也有一条“底线”,如果这个记者或是作家对耀邦同志没有感觉的话,那他是拒绝接受采访的。请注意,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支书,草根出身,他在基层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如此的认识,这是我后来“一湾到底是大道”这个书名的由来。

这样的获奖并不只是作者的事情,特别是五个一工程奖,主要是奖励选送单位,像我之前从未开过个人作品的研讨会,但这次宁波鄞州方面专门搞了首发式和研讨会,虽然最后的奖项并不尽如主办方的人意,但我们为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去努力过了。

华东周刊:这两本书,一部写历史,一部写当下,两个题材也完全不一样,你是怎么把握的?

孙昌建:现实中有历史,历史中有现实。比如我写《鹰从笕桥起飞》,还得采访不少抗战空军的二代三代,要去看现场遗址。比如这一次参加你们的华东周刊笔会,在大理的时候我看地图就注意到祥云县云南驿这个地名,因为这个地方对中国的空军抗战太重要了,我写过的主人公就在这个地方生活过,因为它曾是中国空军的一个大本营,那这一次大理之行等于为以后打好了“前站”。而就整个中国版图而言,如果没有云南,就没有整个中国抗战的胜利,所以这些年我已经去了六七次云南,因为抗战爆发后杭州的航空学校和飞机制造厂,最后都搬到了云南。但是我也并不只是因为工作或写作才去远方,旅行本身还是给人会带来不少收获的,比如这一次我在大理发现了那里的电影档案馆,因为我也在关注老电影这一块,那主要是大理州的农村电影的历史,这可能是十万人中只有一个人会去看的,这一个人就是我。如果十万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,那对于一个作家来讲,也还是要有自己的点,也要寻找不同的方式去表达。

华东周刊:请问这些年写纪实,比如你写空军抗战,有什么写作的心得?

孙昌建:前几天看到 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的一篇演说稿,她认为“某种意义上世界是由文字构成的,谁能讲故事编故事,谁就有掌控权,因此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具有巨大的意义。”她讲这番话的前提是她认为这个世界正越来越变得碎片化、商业化、网络化和喧嚣不宁。我基本认同这个看法。因为这个世界也在改变着作家和诗人的生活方式,比如二十年前两个作家见面,可能更多地是谈最近看了什么书看了什么碟,或者说在哪里可以买到哪一本书,我们都是讲这个内容的,因为这本书和这本碟,或者说由少积多的那十年那二十年的阅读,就是我们全部营养的来源。现在有没有来源呢,也有,你把公号推给我,我再推给他,如此而已,也有可能没等推过去就被删了。那个时候不一样,有一点盗火者的心态,真正好的书我们会去复印一本;看到好的诗集,我会去抄一本,在我还没有条件使用复印机之前。现在我们当然也谈论作家作品,但我注意到谈的多是八卦或是负面的话题。其实作家和诗人是需要相互刺激的,而且要相互批评,但现在很少看到批评,都说自己好,朋友间也相互捧场。我以为没有批评就没有创作,现在一些写得还不错的作家和诗人,也听不得批评,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听到批评的声音,如此一来,声音就有可能被几个人控制了。但是光



你是一个凡人,你想与众不同,这就有了诗歌

——专访作家孙昌建

人 物 简 介

孙昌建:一级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,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抱怨是没有用的,就从自己做起,我从不讲自己写得怎么样怎么样,我就讲自己是怎么写的,或者是事后才发现有很多的遗憾,你不写不知道其难处,写了却往往会有事后诸葛亮,或者叫事后臭皮匠的感觉。

华东周刊:那你能不能就此展开谈一下什么叫事后诸葛亮或臭皮匠?

孙昌建:你在大理笔会上讲了我采访写作项兴良的故事,在这里我愿意再补充一个

细节,因为我感觉写企业家是很难写的,因为你采访他们的时候,他们可能身后是一幅世界地图或上善若水,办公桌上有国旗,然后一排电话,采访时电话和手机铃声不断,旁边还有办公室主任作笔记;如果热情的还带你去车间转转,更热情的一起在食堂吃个饭,仅此而已,还给你一堆资料,你怎么从公共话语中突围出来,你怎么找到他的内心世界?当然现在的很多稿子是不需要内心世界的,但这对于作家来说是最起码的底线。在

《杭商》杂志刊登项兴良文章大约一年左右,也是无巧不成书,我在拉萨的一家农家乐中邂逅了项兴良,当时他跟我认识的画廊朋友在一起,我说你怎么在拉萨,他说刚刚从尼泊尔回来,本来要多待几天的,但朋友高反厉害就提前回来了。那我说你去尼泊尔干什么,收唐卡吗,因为我知道他在做收藏,结果他的回答让我意外,他说他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,他是去拜佛的……他这么一说,我就觉得我这个时候才有点懂他,之前我只是

写了他做了些什么事,而只有知道他内心的困惑之后,我才敢说 I 懂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。

再比如说《一湾到底是大道》的主人公吴祖楣,直到在研讨会上,宁波的诗人荣荣跟我讲也跟大家讲,她说吴是宁波第一个买大奔的人,这在当年是极为轰动的事情……我听了之后脸有点发烫,因为无论是我采访吴还是采访其他人,都没有提到这一细节,我也写到了吴每天早上要骑一辆赛车并且戴着头盔巡村的,且吴的发型也是有点朋克

的,但我没问他开车方面的事情,这一细节的遗漏不仅仅说明我的采访还不深入扎实,同时也影响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,因为他现在的如此低调跟当年的“高调”是恰成对比的,不仅仅如此,更主要能说明他一直是一个很潮的人,比如他每天早上喜欢吃烤面包喝咖啡。我只是写了我看到的事情,还没有去考虑我那些没有看到的事情。

还有我在《鹰从笕桥起飞》中写到了高志航的儿子高耀汉,跟他在南京和杭州聊了几次(我还希望跟他在台湾聊一次),但一开始的聊,我只是让他聊他父亲,虽然高志航牺牲的时候他才两岁,但是在儿子眼里看父亲是什么样子的,这还是不一样的,他当时讲到父亲如果不是在周家口机场捐躯,也肯定会在其他地方,空中或地上牺牲的,他这样说他的父亲,才让我觉得战争的残酷性以及那一代勇士的了不起。人人都有求生欲,何况上有老下有小,身边有娇妻,但那一代英雄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? 那只有一个解释,明知道打不过你,明知道实力不如你,但我也要跟你同归于尽,因为只有这样,国家才不会灭亡,民族才不会亡种!

也许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可以进行写作了,但是渐渐地我又发现,其实高耀汉的故事,包括好多空二代三代的故事,可能比他们父辈的还要生动和丰富,包括这些英雄们的遗孀,但是没办法,书差不多已经完成了,而且我也不可能节外生枝地再去写什么,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讲,由此存了一个丰富的矿藏,为日后的写作埋下了伏笔。这些大概就是事后诸葛或臭皮匠吧。

所以要讲起纪实或非虚构作品,一个作家能写出的,往往是这个故事这个人物的十分之一,正如大海里的冰山,浮出水面的只是有限的一部分,更丰富更广博的还在下面,所以这个是我愿意接触这一题材的原因。但到底写得怎么样,作者心里是很清楚的,采访不到位是根本写不好的,这个是一

点办法都没有的。不管是叫纪实还是非虚构,我总感觉还是要具备一种文学的气质和精神,这种精神首先是一种态度,其次才是一种写法。

华东周刊:我们知道之前你主要的写作体裁是诗歌,目前也担任着省作家协会诗歌创委会主任,那你是怎么想到去写现实题材的?

►►► [下转 A2]